

## 當代土耳其政黨政治與伊斯蘭教之研究

郭秋慶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 摘要

土耳其共和國正義暨發展黨受選民的肯定，堪稱中東國家表率，值得吾人重視。早期凱莫爾籌組共和人民黨，他當選首屆土耳其共和國總統。依照憲法，他是國家權力的核心，市民社會顯得被動、受控制與脆弱。二次大戰後執政的共和人民黨引進競爭的政治，允許成立政黨和政治協會，從此一黨制向多黨制轉變。1960 年軍方發動政變，取締民主黨。依照軍政府頒佈的新憲法，多黨競爭給予了伊斯蘭主義者有發展的機會，伊斯蘭主義者成立正義黨。1961 年正義黨參與聯合政府，1965 年的國會選舉，正義黨贏得單獨執政，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教色彩，成為對抗共和人民黨的主要政治勢力。1990 年之後，伊斯蘭教的中產階級顯著增加，新世代的伊斯蘭教運動領導人艾爾多安成立的正發黨，採取溫和立場與實用主義走進公共領域，所以正發黨三度贏得一黨執政。在中東地區，正發黨採取「經濟優先於政治」的政治主張是罕見的，正發黨證明伊斯蘭教和民主政治是相容的。

**關鍵詞：**土耳其、政黨政治、伊斯蘭教

## 壹、前言

土耳其共和國是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在中東地區人口最多，達 7 千 9 百萬，同時是該地區實現議會共和政體最早的國家，也是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自從 1940 年代末開放多黨競爭以來，由於國內伊斯蘭教人口占優勢，其所推動世俗化 (secular) 的民主政治也就倍受關注，尤其是晚近「阿拉伯之春」帶來國際上相當注意其執政的正義暨發展黨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簡稱正發黨)，是否可以作為地中海地區伊斯蘭教政黨的楷模。

眾所皆知，伊斯蘭教在世界上是三大宗教之一。它作為一神論的宗教，古蘭經和聖訓給予其信徒精神和行為的導引，觸及到生活和社會的每一層面，由飲食、錢財到福利以及戰事等，可謂是相當完整的規範體系，因此伊斯蘭教不但是一套精神信仰，更是一套治理社會的法則。衡諸人類的歷史，在世界秩序的建立上，宗教和政治是最複雜的力量之一，它們經常相互為用，因此伊斯蘭教和民主政治的相容性過去一度受學術界的議論，有主張伊斯蘭教信徒不了解民主政治，僅僅是將它當作一種工具或通往權力的單行道，但是近年來土耳其共和國在民主政治運作下經濟成就顯著，證明這種論點並不太正確。

無可否認，一些中東國家伊斯蘭教的政黨獲得政權，像 2005 年伊拉克國民議會選舉中伊拉克團結聯盟 (United Iraqi Alliance) 獲得過半席位，2006 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中哈馬斯 (Hamas) 贏得壓倒性勝利，但是它們執政後，要不是爆發政壇的衝突，就是執政的表現不佳，然而土耳其共和國自從 2002 年國會選舉，正發黨的執政卻倍受選民肯定，一度堪稱中東國家實施民主政治的表率，值得吾人重視。

土耳其共和國的民主政治是議會民主制 (即內閣制)，總理是政府的首長，當今國會 (即大國民議會) 計有 550 席，由政黨名單比例選舉制產生，並設有全國 10% 選票的高門檻，政黨的成立眾多，除了少數派政黨之外，有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宗教以及左翼屬性的政黨等，它們在相互的競爭政權中，凡是違反世俗主義的原則，容易遭受政府相關部門的黨禁。

本文將從該國政教關係的歷史和現實政治運作兩個層面，探討土耳其共和國的政黨政治中伊斯蘭教政黨的崛起和遭遇，以利了解其當前政治的狀況。

## 貳、從革命政黨到政黨公開競爭

### 一、革命性單一政黨時代

1923年土耳其和西方列強及希臘簽署『洛桑和約』(*Treaty of Lausanne*)，明確劃定土耳其與希臘、法國委任統治的敘利亞、英國委任統治的伊拉克之間的邊界線，取消西方列強在土耳其的治外法權，從此土耳其作為主權國家站上國際舞台，凱末爾(Mustafa Kemal)隨即在安納托利亞和魯美利亞保護權益協會的基礎上籌組政黨，經過內政部的申請成為第一個政黨-人民黨，不久即改稱為共和人民黨(Republic People's Party)，黨員來自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以及宗教與世俗的諸多背景或社會階層，且具有民族主義的色彩，當年10月凱末爾被選為共和國首屆的總統。

1924年土耳其共和國國會頒佈憲法，該憲法充分體現共和人民黨的共和主義、世俗主義(secularism)、革命主義、國家主義與民眾主義的政治綱領(Heper, 1991: 513)，國家憲政體制採行立法與行政匯一，總統由國會間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總統得以任命總理，統率三軍，是國家權力的核心。由於凱末爾總統本身有克里斯瑪式的政治魅力和廣泛的政治權力，面對鄂圖曼帝國的疆域收縮，以及歐洲經濟與政治擴張的威脅，在沿襲過去強大官僚主義的傳統下，黨政不分，形成所謂的凱末爾主義者(Kemalist)致力國家的現代化，他們以西方式開明專制模式(Berkes, 1964: 21)，實施以國家為中心、精英定義以及非自由主義的現代化計劃，從而削弱伊斯蘭教的政治原則。

由於共和人民黨全力地支持凱末爾總統，凱末爾得以連任四屆，直到1938年逝世才下台。其間凱末爾主義者全力貫徹世俗主義，廢除哈里發(caliph)神權制度，將伊斯蘭教置於國家掌控之下，以利除掉阻礙國家現

代化運動的障礙。換句話說，凱末爾主義者倡導政治與宗教的領域分開，將伊斯蘭教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並以國家規範人民的宗教生活，為此凱末爾的政府設立了宗教事務理事會 (Diyanet)<sup>1</sup>。

土耳其共和國推動的世俗化主義，受到國內資深文官、城市精英、新女性主義的婦女以及軍方的支持下，完成的改革有廢除伊斯蘭教的國王地位 (Caliphate)、伊斯蘭教的法律、伊斯蘭教的司法以及具影響力的伊斯蘭教兄弟會<sup>2</sup>，建立起像瑞士的非宗教民事法典以及義大利的刑事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典有關結婚與繼承的規定相當令國人滿意，譬如一個男人不許娶四位太太、離婚不是男人的權利以及財產繼承不再重男輕女等。再者，土耳其共和國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波斯書寫文字，西曆取代伊斯蘭陰曆，星期日取代星期五為每週的假 (主) 日，不再允許穿戴傳統的頭飾，像男性的氈帽與女性的頭巾，以增強新的國家秩序 (Hanioglu, 2012: 43)<sup>3</sup>。

再者，土耳其共和國在總理府設立的宗教事務理事會，是伊斯蘭教最高的權威，它的主席由總理任命，作用上十分像國家教會，不但控制人民的宗教生活，而且對伊斯蘭教提出全國通行的論述，以排拒民間反動與危險的解釋。若依照憲法第 136 條規定，宗教事務理事會負責執行有關信仰、崇拜與伊斯蘭教倫理，啟迪民眾的宗教意識以及管理崇拜場所 (Hanioglu, 2012: 43)。自從該理事會成立以來，它負責任命、解職以及訓練所有的牧者 (iman)、講道人 (hatib) 以及祈禱召喚人 (muezzins) 等，同時指派牧者從事佈道、核准佈道內容與籌備每年到麥加朝聖，並且管理宗教與普通學校的宗教課程以及古蘭經課程。無庸置疑，伊斯蘭教的專職人員是國家編制的雇員，他們領取國家的薪資，迄今約 9 萬名，其經費經過國會的批准，而且較一些重要部級機構像外交部的薪資高，迄今每年總經費約 11 億美元 (Akan, 2011: 30)。

其次，由於凱末爾總統強調土耳其需當作歐洲國家的成員，因此凱莫

<sup>1</sup> 1937 年世俗化主義的原則納入憲法之中。

<sup>2</sup> 1928 年刪除憲法的伊斯蘭教為國家宗教條文 (Onar, 2007: 275)。

<sup>3</sup> 宗教事務理事會亦認定，伊斯蘭教神秘主義的蘇菲派 (Sufi) 與什葉派分化出來的阿列維派 (Alevi) 對國家具有潛在的威脅，宣布它們為非法 (Onar, 2007: 275)。

末爾主義者推動統一的民族認同，國內所有的人民不管其出身背景，均是土耳其人，像東部的庫德族或來自巴爾幹的穆斯林難民等亦是( Shadid, 2002: 145)，每個土耳其人皆需投入民族國家的建立，將個人放在次要地位，重視團體對國家良善的喜愛，譬如以土耳其語而不是傳統阿拉伯語從事祈禱，從此在中央集權的教育與安全機構的宣導下，凡是拒絕如此作的人，均被解釋成分裂分子。

基於此，凱末爾的現代化運動表現出國家主義與具有由上而下的特點，當時除了國家在經濟活動上占盡優勢，更形成以精英為主的政治社會，其中含蓋共和人士、文官人員、司法高級人員、軍方將領以及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等，所以在凱末爾的共和人民黨一黨主政下，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形成顯得被動、受控制與脆弱(Frey, 1965: 303)，即使凱末爾總統曾經推動建立反對黨的實驗，像 1924 和 1930 年「進步共和黨」和「自由共和黨」，只不過它們的存在短時間就被取締或自行解散(Kedourie, 1992: 108)，直到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凱末爾的共和人民黨是國內唯一的革命性政黨。

## 二、政黨出現輪替執政

在革命性單一政黨時代，土耳其共和國的現代化運動，主要侷限在上層精英社會和城市。二次大戰結束後土耳其國內的政治對立逐漸加劇，國會成為諸多政治團體角力場所。早在 1944 年底從凱末爾接下權力的伊諾努(Ismet Inonu)總統，在國會的演說即強調憲法賦予國會權力，允許實行民主政治和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存在(Ozbudun, 2002: 14)，其旨在疏緩國內出現的政治爭議。由於共和人民黨對國家權力壟斷出現鬆動，以致於 1945 年 5 月國會審議新土地分配法時，分歧與對立呈現明朗化，首都伊斯坦堡的企業家德米拉格(Nuri Demirag)站出來創立第一個反對派的國家發展黨，主張實施自由主義和發展私人經濟。待 1946 年初，幾位脫離共和人民黨議員也成立民主黨(Democrat Party)，反對國營企業的特權地位，其成員多數來自不滿共和人民黨的社會團體(Yilmaz, 2012: 364)，促成共和人民黨不得不進行黨內民主化，1946 年 7 月國會的選舉，民主黨贏得國會 465 席

的 62 席，開闢了執政黨與反對黨角逐國會議席的先河。

無可否認，民主黨肯定凱末爾總統實現民族獨立和改造社會方面的功績，但是它宣布爭取更大的政治與經濟自由，特別是放鬆國家管制。此時土耳其共和國在國際上抗衡蘇聯，1947 年 7 月和美國簽訂了防衛協定，獲得 1 億美元的軍援，隔年 7 月又和美國簽訂經濟合作協定(即馬歇爾計劃)，獲得 3 億美元的貸款，以振興國內經濟。若土耳其當時能引進競爭的政治以及使法律體系自由化，將是良好的政策，更能彰顯它是一個民主國家，所以共和人民黨的政府便決定修改 1938 年製訂的『社會團體法』，宣布允許成立政黨和政治協會，從此一黨制向多黨制轉變成為不可遏止的潮流，據統計到 1950 年約有 27 個大小政黨成立，而且工會組織亦達 80 多個。

在多黨競爭的環境下，1950 年第 2 次國會的選舉，直接選舉取代過去の間接選舉，司法機關取代行政機關監督選舉程序，同時實施祕密投票和公開計票 (Ozbundun, 2002: 17)。在這次選舉中，民主黨作為反對黨，除了利用一些伊斯蘭教徒和部分保守農民對世俗化改革的不滿，在宗教界和農村進行廣泛的活動，在每個選區提名有聲望和地方上有支持者的候選人，因此在投票率高達 89% 下，民主黨獲得高達 424 萬票 (53.3%)，勝過共和人民黨的 318 萬票 (39.9%)。依照政黨名單比例選舉制，民主黨獲得 487 席的 408 席，而共和人民黨則僅分到 69 席，民族黨 (Nation Party) 亦有 1 席 (Wikipedia, 2015)，因此首次的政黨輪替出現，民主黨籌組的新政府由曼德列斯 (Adnan Menderes) 擔任總理，內閣有 14 名部長。該政府實施工業機械化與自由企業的經濟擴張政策，而且提供農民優惠的貸款發展農村經濟，帶給該黨贏得 1954 年與 1957 年兩屆國會選舉的勝利，不過共和人民黨作為凱末爾主義的象徵，長期以來在文官體系和軍方有較大的影響力，儘管喪失了執政的地位，仍不失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加上擁有雄厚的財力，無疑是挑戰民主黨執政的潛在威脅 (Heper, 1997: 45)。

## 參、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主義者的社會分歧

### 一、伊斯蘭主義者投入政治活動

民主黨在執政時期，雖然致力自由的政策，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曼德列斯總理後期行為專斷，譬如利用國會通過「限制出版法」，逮捕指責民主黨的反對黨人士，禁止人民集會、遊行和示威以及勞工的罷工，妨礙了溫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若究其背後原因在於，一、民主黨領導人來自共和人民黨，他們的政治生涯已經被共和人民黨的威權統治所形塑；二、共和人民黨鋪下的多黨政治，其實並不準備終止控制政治體制，而是要由共和人民黨監督民主政治（Karpal, 1959: 147），所以當大學生對曼德列斯的政府進行街頭示威，1960年軍方隨即發動政變，藉機取締執政的民主黨，另行成立全國團結委員會接管政權，而當時的文官、知識分子以及學者都大表支持此一行動。

軍政府成立後一年半頒佈新憲法，這是一部自由的憲法，保證公民和政治的自由，允許政治團體的建立，然而有些方面卻提供凱末爾主義者的國家精英掌有控制政府體系的工具，因為司法調查權被強化，文官和軍官有檢查民選機構決策的權力，而且也保存政權當中凱末爾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不過在多黨競爭的環境下，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仍有發展的機會（Heper, 1997: 45）。

其實，在多黨競爭的民主體制下，也無可避免帶來國家對人民宗教生活掌控的鬆弛化（Berkes, 1964: 461-79），參加古蘭經課程的人數增加，更多的人自行進入清真寺，甚至非法的傳統兄弟會興起，像 Naksibendis 與 Kadiris 等，不少宗教團體與它們有所連繫，加上新聞的相關法律自由化，雜誌與報紙的印行，伊斯蘭主義者的動員變得具有潛力，他們參與政治活動，譬如右翼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協會（Nationalists' Association of Turkey）人士投入民主黨，另外伊斯蘭教的民族主義者，也成立民族黨（Nation Party）（Berkes, 1964: 461-79）。一般而言，前者匯聚各種政治的勢力，不過它也是伊斯蘭主義者參與的政治組織，而後者即使是較小的右派政黨，也有地

方與國家層級的伊斯蘭主義者參與 (Çinar & Sezgin, 2013: 330-33)。

雖然民主黨最後被軍政府查禁，但是民主黨的地方領導人轉而成立正義黨 (Justice Party)，除了繼承伊斯蘭主義者的理念，強調現代專業以及勞工與農村人士的觀點，該黨參與 1961 年國會的選舉，獲得 450 席當中的 158 席，而共和人民黨獲得 173 席。由於這兩個多數黨均不具國會多數，因此首次出現共和人民黨和正義黨組成聯合政府，並由共和人民黨主席伊諾努擔任總理，但是正義黨一起執政時，嘗試解除過去政變軍方對民主黨領導人的禁令，卻遭軍方領導人的反對，因此伊諾努總理任期內為調解兩黨聯合執政的緊張關係，7 個月後該聯合政府就解散了 (Yilmaz, 2012: 365)，直到 1965 年國會選舉前，不同派別的聯合政府更換達 4 次之多，造成政局不太穩定。

待 1965 年國會的選舉，正義黨獲得重大的勝利，450 個席位中贏得 240 席，共和人民黨則僅獲得 134 席，因此正義黨得以單獨執政，該黨在德米雷爾 (Suleyman Demirel) 領導下，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教色彩，是對抗共和人民黨的主要政治勢力，因為正義黨的社會基礎來自民間團體，這是由伊斯蘭主義者建立的有效網絡，包括專業和商業協會、婦女組織、學術團體、穆斯林人權協會以及文化社團等，他們的心聲是伊斯蘭教關心的事，並沒有被世俗的相關單位注重 (Toprak, 1981: 22)，所以正義黨不但由大量伊斯蘭主義者支持，而且伊斯蘭主義者也變成更加組織化以及具有獨立性。

## 二、伊斯蘭主義者的政黨不斷更迭

伊斯蘭主義者加入正義黨，他們與土耳其共和國追求的世俗化理念並不一致，其實他們為的是反對共和人民黨對宗教的掌控，而欲推動由伊斯蘭教的法律統治，其中涉及社會、政治與經濟的論辯，於是國內日益出現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之間的緊張 (Yilmaz, 2012: 364)，表現在如何界定土耳其人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如何塑造政治結構。但是，這個社會分歧直到 1980 年因為軍方再度介入接管政權，並取締政黨和工會組織，凱末爾主義者遂依然占有優勢。

不過，自從 1960 年代以來伊斯蘭教日漸在社會和文化領域獲得能見度，



及至 1965 年政治再度的自由化，政黨地位的提高明顯，因為國會通過的政黨法規定，「在國會中獲得最多席位（不少於 45 席）的在野黨主席，在國家禮遇中僅次於總理之後，而居於內閣其他成員之前」，結果政黨的成立受到鼓勵，不過共和人民黨和正義黨仍然擁有最多的席位，只是都沒有達到絕對多數，不易出現一黨組閣，至 1980 年軍方發動的政變時，由於政黨相互的爭權奪利，政局動盪造成內閣執政時間平均每屆不到一年。

在這段時間中，值得吾人重視的，除了正義黨有伊斯蘭主義者的勢力，在以伊斯蘭教為基礎下，不少受打壓的宗教團體屢屢提出他們的需求，最後由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領導的伊斯蘭教政治人士，像過去為民族黨遭查禁的辯護律師 Necip Fazil、Esref Edip 與 Süleyman Arif Emre 等，在納格什班迪教團的支持下，1970 年建立第一個伊斯蘭教的政黨，稱為民族秩序黨（National Order Party）（Yilmaz, 2012: 365），該黨強調民主政治的施行，不能沒有思想與信仰的自由，反對「利用世俗主義原則」迫害宗教，同時該黨倡議限制大商業資產階級，抵制西方資本主義，恢復伊斯蘭教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實施伊斯蘭法律。然而一年半之後因為憲法法院認定，該黨「尋求恢復神權政治的秩序」，與憲法規定牴觸，宣布民族秩序黨為非法政黨，並加以取締（Landau, 2004: 144-45）。

事實上，民族秩序黨被認定為反世俗主義，主要是因為世俗精英拒絕將公民與政治權利授與這些伊斯蘭教人士，這樣的民主概念導致土耳其官方既排除激烈伊斯蘭，也排除溫和伊斯蘭教的信徒（Heper, 1997: 45），然而埃爾巴坎為了維持伊斯蘭教的傳統，以及促進經濟與社會的改革，1972 年他和親信再度建立新的政黨，稱為救國黨（National Salvation Party）。依照該黨的社會經濟理念，反應出「那些想在現代性的擴大下，獲取更大政治與經濟角色的人士之抗議」，有意促成伊斯蘭主義者進入公共與政治領域，以影響政治過程，以及使他們自己感覺是體制內的人，或真正的公民（Balkan & Savran, 2002: 111）。

可是，1970 年代救國黨的選舉記錄，並不令人印象深刻，凱末爾主義者也視它為世俗主義不可容忍的政黨，因此 1980 年軍方基於聯合政府內部對峙，社會的意識形態兩極化，加上國家遭受經濟危機，遂發動政變接管

政府，隔年救國黨即被認定與世俗主義的政治原則抵觸，遭憲法法院取締，此時的土耳其共和國可謂處在某種的正當性危機（Heper, 1991: 45）。

## 肆、伊斯蘭教的政黨挑戰世俗政黨主導的地位

### 一、經濟自由化下政治伊斯蘭的興起

1982 年在軍方監護下擬定新憲法，此時厄札爾（Turgut Özal）建立的祖國黨（Motherland Party），由伊斯蘭復興運動者和世俗的自由主義者組成，投入隔年國會的選舉，獲得 399 席的 211 席成為多數黨，而軍方所支持的候選人並沒有獲勝，於是厄札爾黨主席籌組政府出任總理，這次選舉可謂對市民社會的興起具有重大意義（Aral, 2001: 74）。再者，1987 年國會的選舉，祖國黨獲得 450 席的 292 席，再度繼續執政，厄札爾在這段執政時期，政治上擴大自由空間，廢除新憲法第 141、142 與 163 條禁止思想自由，挑戰凱末爾主義的國家精英（Saha, 2001: 40），尤其是將媒體脫離國營壟斷，准許經營私人電視台與廣播公司，社會上各種非政府組織與人權協會遂日益成立。再者，厄札爾總理倡議土耳其整合到歐洲聯盟（當時稱歐洲共同體），完全接受西方民主價值與制度，受到新興知識分子的支持。

其次，厄札爾總理在經濟上採行新自由主義，從事自由市場的改革，使得私有經濟擴展到大都會的邊緣地帶，並且擴大與外國的商業競爭，由此孕育出安納托利亞（Anatolia）資產階級以及城市中產階級，從而凱末爾主義的國家精英享有的特權受到質疑，甚至寡頭資產階級的「土耳其工業暨商業協會」（TÜSZAD）也喪失特權<sup>4</sup>，最後促成國內在民間團體的日益興起下，傳統鄉村的價值與城市的規範連結在一起，造成伊斯蘭的社會和經濟階級的擴大，他們的政治角色與權利出現極大的發展，開創出新的市民社會，而且其世界觀是直接以傳統的伊斯蘭概念型塑出來（Warhola &

<sup>4</sup> TÜSZAD 是 1971 年由一小群的大企業家建立，他們與政治當局關係密切（Alam, 2009: 367）。

Bezci, 2010: 18)。

此外，凱末爾主義者在當時盤算是錯誤的，因為他們擔心蘇聯的擴張與土耳其的左派政黨，將伊斯蘭信仰作為公民致力民族團結與政治穩定的工具，因此宗教事務理事會的任務朝向促進民族團結，加重學生的宗教課程，大學生也開始戴傳統的頭飾，完全忽略了興起中的伊斯蘭政治勢力（Gürbey, 2009: 37-38）。

當吾人觀察伊斯蘭教團體的活動，可以發現社會上一些激烈的伊斯蘭主義者增強他們的聲音，公開地要求伊斯蘭法律（Sharia），而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者批評凱末爾的意識形態，宛如世俗國家的批判者，至於軍事化的伊斯蘭團體像真主黨（Hezbollah）與大東伊斯蘭襲擊者陣線（IBDA-C），則宣稱訴諸暴力，要求採行伊斯蘭法律，尤其是眾多的伊斯蘭主義者宣布，凱末爾的意識形態是鎮壓與反民主的（Yilmaz, 2012: 373）。

總之，在厄札爾總理的時代，這股新興政治的伊斯蘭（Political Islam）勢力，反應他們認為伊斯蘭教的世界需要加速發展，以便趕上新世紀，因此當時伊斯蘭主義者從事的改革運動，是將道德、宗教與現代生活、自由市場以及政治競爭連結在一起，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建設下，創造出經濟的新富裕與獲利的贏家與劣勢與貧困化的輸家，使得伊斯蘭信仰為人所青睞，特別表現在那些經濟的輸家，也就是被排除在全球化的經濟利益之外的人。

## 二、伊斯蘭教的福利黨追求新認同

政治的伊斯蘭勢力的增強，始於1983年成立的福利黨（Welfare Party），該黨繼承民族秩序黨和救國黨，1987年投入國會選舉，埃爾巴坎出任黨主席，獲得7.2%的選票，為全國第4大黨，雖然未能分得國會席位，但是1991年國會的選舉，該黨則獲得兩倍多的選票達16.9%，國會席位62名，等到1995年國會的選舉，該黨受歡迎的程度達到高峰，獲得21.3%選票，國會席位增至158名，成為全國最大的政黨（Yilmaz, 2012: 366）。

從1990年以來，福利黨選票的增加，一方面是因為該黨將伊斯蘭主義（Islamism）由威權主義和集體認同，譬如追求伊斯蘭國與伊斯蘭革命，轉

向聚焦個人主義的伊斯蘭教之需求與經驗，重視個人的主體性與生活 (Duran, 2010: 5)；另一方面是因為該黨致力於再創昔日土耳其民族的驕傲，埃爾巴坎黨主席演講亦常強調，土耳其有更大的潛力作為穆斯林世界的領導人，就如同鄂圖曼帝國幾個世紀的表現 (Yilmaz, 2012: 367)。尤其不能忽略，福利黨給人民希望，使人民相信未來將更好，這乃因為該黨推出「公義的秩序」(Just Order) 計劃，以土耳其社會良好的社區相互賙濟 (Communitarian) 作基礎，強調團結、和諧與公正 (Yilmaz, 2012: 368-69)。就其內涵而言，這個計劃由 4 個相關面向組成，分別是政治上強調必需贏得政治權力，才能更好地處理國家財富分配，同時執政是從事社會調整所必需的工具；經濟上主要集中於社會正義的課題，要將銀行利益排除於經濟領域之外；科學上拒絕自由表達的阻礙，鼓勵現代技術和科學進入吾人所發現的場域；最後宗教與道德上主張減少削弱中的道德感覺，建立伊斯蘭教的精神生活，道德則要求辛勤工作與社區服務，以達成社會和平。不管福利黨這個中央計劃是否切合實際，國家財富分配的不公正，貪污以及感覺喪失自由，加上世俗的政黨提不出符合人民期待的對策，福利黨當然會贏得相當多人的支持。

然而，1997 年 2 月 28 日軍方占優勢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有必要保障世俗化的秩序，決定停止福利黨的執政，憲法法院再以反世俗化的政治活動與鼓舞激烈的伊斯蘭教，宣判禁止該黨，這次凱末爾主義者再度的世俗化動作，造成伊斯蘭運動的財源與社會團體與協會遭嚴加控制，伊斯蘭教所屬的基金會舉辦古蘭經課程被取消，中等教育的宗教學校被關閉，這個所謂「228 過程」的結果，衝擊到伊斯蘭教社會與經濟的基礎，以及它的政治代理機構 (Burak, 2011: 67)。不過，福利黨的政治理念並沒有消失，改由新成立的賢德黨 (Virtue Party) 繼承，只是 2001 年該黨還是被憲法法院判決黨禁 (Cizre & Sinar, 2003: 309-13)。然而，這次判決對大多數伊斯蘭主義者沒期待的結果是，促成法律內以及合法的伊斯蘭教義受到人民的歡迎，而且有追求福利黨正統理念的幸福黨 (Happiness Party)，以及更為溫和與含有伊斯蘭教概念的正發黨的成立。

### 三、正發黨異軍突起獲得執政

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下，土耳其共和國的貿易出口帶來不少公司獲利，伊斯蘭教的中產階級顯著增加，所謂「第二代資產階級」，尤其是中小型企業主與自雇者，他們為了伊斯蘭教的資產階級利益，組成「獨立的工業暨企業協會」（MÜSIDA），這實在反應出 2000 年代伊斯蘭主義者已經走入轉型期，伊斯蘭教的團體出現溫和立場（Bozkurt, 2013: 392），主要像居爾（Abdullah Gül）和埃爾多安（Recep T. Erdogan）推展的伊斯蘭教運動，他們兩人以新世代的伊斯蘭主義者身分，嘗試弱化國家對社會的干涉，擴大社會和個人的選擇和差異，並以現代化的伊斯蘭教認同，以及更為容忍和實用主義的方式走進公共的領域，以利鬆弛政治的伊斯蘭和世俗主義建制之間的緊張。

2001 年脫離賢德黨的埃爾多安成立正發黨，改變過去政治的伊斯蘭所倡導的理念，將保守主義、伊斯蘭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理念混合。其中就保守主義而言，他們將黨的目的訴求維持社會秩序，尤其重視制度上的保護，譬如家庭傳統等；其次，就伊斯蘭主義而言，他們認為保守主義的內容由宗教決定，需遵循伊斯蘭教（Yavuz, 2009: 154-59）。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風險，即貧窮、不平等與失業，將由家庭、宗教以及伊斯蘭教的社區予以減低，而且家庭有一項功能是，在國家和社會被描述成快樂的大家庭下，大家尊重傳統，分享相同的價值，過著合諧的生活，以及在家庭中解決問題，譬如庫德族問題，因此伊斯蘭主義可以說是用來和人民建立連繫關係；最後，就民族主義而言，他們認為土耳其的社會和文化認同，既不是歐洲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具有宗教價值與傳統的文明與文化，這源自鄂圖曼帝國的遺產（Cizre & Çinar, 2003: 382）。

這樣新興的正發黨，面對 2002 年國會的選舉，並不提出伊斯蘭主義的政治綱領，僅提出「麵包和民主政治」綱領，優先處理人民的物質問題（Cinar, 2006: 473），結果獲得 34.2% 選票，在 550 名總議席中獲得 363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共和人民黨則僅獲得 20% 選票與 173 席，其他政黨沒有超過 10% 門檻，無法進入國會，最後由埃爾多安出任新總理。由於正發黨一

黨執政，致力經濟改革，較過去世俗政黨表現得更好。基本上，它採行經濟的新自由主義，著重改善勞動市場，將彈性勞動像兼職、契約、臨時與轉包工作合法化，降低了外來勞動人口，而且出口貿易呈現快速的成長，年平均經濟成長 7.3%，不但對土耳其和中東地區而言，都是執政成就顯著（Ghanim, 2009: 80）。

再者，正發黨減少公共義務的社會福利，將它轉移到慈善團體、救助協會以及私人部門負責，此帶給該黨社會援助計劃（social assistance）接下一些國家的功能，既可不受國會的監督，還時常可以獲得政府提撥的款項，這樣的民粹措施，使得該黨得以回應人民短期的需求，進而擴大支持的基礎（Burgra & Keyder, 2006: 211-28）。此外，正發黨強調與西方世界對話與互動，2004 年決定與歐盟展開入會談判，這項策略的選擇為的是，利用歐盟以協助達成文人政府管理軍方，以及強化宗教的自由，特別是透過立法准許穆斯林婦女在政府機構與大學裡穿戴伊斯蘭教頭飾。

待 2007 年國會的選舉，正發黨執政的政策獲得肯定，而形成該次選舉有如對其信任投票，因為該黨以具體行動履行對選民的政治承諾。若進一步看，溫和的政治與經濟獲得成長兩大因素，使得伊斯蘭主義者不得不審視其正當性的來源，因為正發黨所傳遞的信息是，正當性源自人民而不是上帝（Ghanim, 2009: 79）。

在這種情況下，2011 年國會的選舉，正發黨更獲得 49.8% 選票與 327 個席位，第三次連任且一黨執政，不過該黨長期的執政後，日益形成威權式統治，於是爆發政治的動盪，因為 2 位共和人民黨和 6 位支持庫德族的和平暨民主黨議員遭受囚禁，前者被指控捲入 Ergenekon 醜聞，後者則被指控與暴力的庫德族分離組織有關係（Fabbe, 2011: 657-63），而且 2013 年正發黨政府爆發貪污醜聞，因此反對黨在 Gezi 公園展開抗議活動，然而正發黨政府以威權回應，引起國際的遣責，隔年埃爾多安總理遂宣布代表正發黨改而參加總統選舉，還獲得 51.79% 選票當選總統。雖然總統的職位應該保持政治中立，但是埃爾多安總統介入政治，批評反對黨，並且宣布修改憲法，要將議會民主制改成總統制，加上正發黨政府的威權主義與貪污行為。2015 年 6 月國會的選舉中，正發黨還出現選舉欺騙與政治暴力，

以致於在野的世俗主義與自由主義者的政黨得以終結其一黨統治，正發黨的選票大降 8.96%，議席則減少 53 席僅擁有 258 席，首次不再是國會的多數黨，不過它仍是第一大黨（Gursel, 2015），埃爾多安總統為此不但倍受正發黨指責，而且該黨喪失了發動修憲的機會。

## 伍、結論

土耳其共和國實施半個多世紀的民主政治，雖然存在若干缺陷，譬如軍方常指導政治動作，但是無可否認民主政治提供改變的管道與希望，因為其選舉自由與政黨多元，新聞媒體能夠發聲，加上工會獨立以及非政府組織眾多，包括人權與遏止政府濫權的團體等（Howe, 2000: 88）。綜觀土耳其民主的成功，顯示它本身有能力解決中東地區政治伊斯蘭所面臨的挑戰，一是伊斯蘭和民主政治的關係，二是伊斯蘭和外人的關係，不管是在國內或外國，所以說土耳其多黨競爭的民主經驗，對於中東和地中海伊斯蘭教地區，尤其是仍陷在極端主義暴力的國家，以及不具有「溫和主義」政治的國家，可謂是一重大的啟示。

本文探討土耳其共和國的伊斯蘭教與政黨政治的演展，最後可以提出下列的看法：

1. 土耳其政黨的成立，除了具有恩庇侍從的性質，其本身制度化的發展偏弱，不過多黨政治是其政治民主化的實體，亦是現代化的推手，這股政治力量從上層精英社會向下層民眾社會延展，以及從城市向鄉村延展。一般而言，土耳其的世俗政黨獲得文官、軍方高層與傳統知識精英等支持，而伊斯蘭教的政黨則不僅具宗教色彩，更有階級傾向，不少來自弱勢和邊陲的社會群體。世俗政黨與伊斯蘭教的政黨之間權力的角逐，多少呈現精英政治與民眾政治的對抗，同時體現政治生活的多元化與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走向。
2. 早期政治在世俗化運動的過程中，出現獨裁式的權力集中，並沒有公民廣泛的參與，主要是因為缺少一個主導性的社會階級，亦即資產階級，導致統治模式很大程度建立在個人權力體系和精英團體的

基礎上。政治上有定期舉行的選舉，但是在社會和政治之間，並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群眾政黨加以連結起來。

3. 雖然伊斯蘭教的政黨不斷遭到世俗化政黨與政府建制的壓制，甚至被稱為破壞憲法上限制宗教進入公共領域，而受到黨禁的處分，但是伊斯蘭教信徒改變政黨名稱後，其勢力仍繼續存在。自從 1980 年代以來，新興伊斯蘭教的政黨開始推展伊斯蘭教的現代性，譬如新世代領導人埃爾巴坎和埃爾多安均強調，建立幸福的社會是他們最終的目標，在選舉基礎上的民主政治，則是實現其最終目標的工具，這實在相當切合當今伊斯蘭信徒生活的需求。由於他們由下而上致力於伊斯蘭化，伊斯蘭教徒參與伊斯蘭專業協會與私人的自願性組織增多，同時他們設立醫院、護理中心、青年俱樂部與外語學院等，確實掌握草根的需求，在經濟生活改善下，打下了伊斯蘭教強大的社會基礎。
4. 「經濟優先於政治」，在中東地區這樣的政黨主張是罕見的。新興伊斯蘭教的政黨相當具體地改善人民日常的生活，尤其是正發黨，它將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伊斯蘭主義頗為奇特地組合在一起，作為新崛起的虔誠派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而且該黨更證明與世界的交往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對伊斯蘭教的中東地區是有益的。

總之，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發黨執政 13 年後，失去了國會的多數，令他一時無法從事憲政變革。不過，2016 年 6 月正發黨在籌組聯合政府不利的情況下，11 月舉行的重新選舉前不久，首都安卡拉遭到伊斯蘭國聖戰士投擲炸彈，造成遊行活動的最血腥死傷事件，埃爾多安總統遂提出投票給執政的我們，否則國家陷入混亂的訴求，加上當時歐洲受困於取道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湧入，歐盟宣布提供埃爾多安現金來協助解決安置難民 (Gotev, 2015)，使得這個陷入族群和宗教派別明顯裂痕以及經濟處於困境的土耳其，選舉最後出現正發黨選票提高到 49.4%，在 550 席的國會中獲得 316 席，正發黨再度能夠一黨執政，因此埃爾多安總統的權力獲得鞏固，未來他是不是越加的專制，以致於將憲政體制改成總統制，實在值得吾人觀察。



## 參考文獻

- Akan, Murat Twin. 2011. "Twin Tolerations or Siamese Twins? Kemalist, Laicism and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in Douglas Chalmers, and Scott Mainwaring, eds.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cy: Essays in Honor of Alfred Stephan*, pp. 381-423.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Alam, Anwar. 2009. "Islam and Post-Modernism: Locating the Rise of Islamism in Turkey."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 20, No. 3, pp. 352-75.
- Aral, Berdal. 2001. "Dispensing with Tradition? Turkish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during the Özal Decade 1983-1993."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7, No. 1, pp. 72-88.
- Balkan, Nova, and Sungur Savran. 2002.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lass, 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 Berkes, Niyazi.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 Bozkurt, Umut. 2013. "Neoliberalism with a Human Face: Making Sense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s Neoliberal Populism in Turkey."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77, No. 3, pp. 372-96.
- Burak, Begüm. 2011. "Turkish Political Culture and Civil Society: An Unsettling Coupling?"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1, pp. 59-71.
- Burgra, Ayse, and Keyder, Caglar. 2006. "The Turkish Welfare Regime in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 16, No. 3, pp. 211-28.
- Cinar, Menderes. 2006. "Turkey's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AKP Rule." *Muslim World*, Vol. 96, No. 3, pp. 469-86.
- Cizre, Umit, and Menderes Sinar. 2003. "Turkey 2002: Kemalism, Islamism and Politics in the Light of the February 28 Process."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02, Nos. 2-3, pp. 309-33.
- Çinar, Menderes, and Ipek Gencel Sezgin. 2013. "Islamist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the Early Years of Multi-party Politics in Turkey: 1945-60." *Turkish Studies*, Vol. 14, No. 2, pp. 329-45.
- Gursel, Kadri. 2015. "Turkish Civic Society Mobilizes against Election Fraud." *Al-Monitor*, May 28 (<http://www.kurdishinstitute.be/turkish-civic-society-mobilizes-against-election-fraud-kadri-gursel/>) (2015/12/4)
- Duran, Burhanettin. 2010. "The Experience of Turkish Islamism: Between Transformation and Impoverishment."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2, No. 1, pp. 5-12.

- Fabbe, Kristin. 2011. "Analysis of Current Events – Doing More with Less: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Turkish Elections, and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Turkish Politic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9, No. 5, pp. 657-66.
- Frey, Frederick. 1965. *The Turkish Political Eli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nioglu, Sükrü. 2012.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Kemalism," in Ahmet Kuru, and Alfred Stephan, eds. *Democracy,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urkey*, pp. 32-5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hanim, David. 2009. "Turkish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Islam."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4, No. 1, pp. 75-84.
- Gotev, Georgi. 2015. "Erdogan's AKP Wins Crucial Election." *Eur.Activ.com*, November 2 (<http://www.euractiv.com/sections/global-europe/erdogans-akp-wins-majority-crucial-election-319068>) (2015/11/2) (November 5, 2015)
- Gürbey, Sinem. 2009. "Islam, Nation-State, and the Military: A Discussion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 29, No. 3, pp. 371-80.
- Heper, Metin. 1991. *Political Party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London: I. B. Tauris & Co.
- Heper, Metin. 1997.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Toward a Reconciliatio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1, pp. 46-58.
- Howe, Marvine. 2000. *Turkey Today: A Nation Divided over Islam's Revival*,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Karpat, Kemal. 1959. *Turkey's Politics: The Transiti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dourie, Elie. 1992.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dau, Jacob M. 2004. *Exploring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 London: Hurst & Co.
- Onar, Nora. 2007. "Kemalists,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hifting Patterns of Confrontation and Consensus, 2002-2006." *Turkish Studies*, Vol. 8, No. 2, pp. 273-88.
- Ozbudun, Ergun. 2002.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Saha, Ömer. 2001. "The Inevitable Coexistence of Civil Society and Liberalism: The Case of Turkey."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Vol. 3, No. 2, pp. 35-50.

- Shadid, Anthony. 2002. *Legacy of the Prophet: Despots, Democrat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Isla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Toprak, Binnaz. 1981.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Leiden: Brill.
- Warhola, James, and Egemen Bezci. 2010. "Religion and State in Contemporary Turke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Laiklik."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52, No. 3, pp. 427-53.
- Yilmaz, Muzaffer Ercan. 2012.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Welfare Party." *Turkish Studies*, Vol. 13, No. 3, pp. 363-78.
- Yavuz, Hakan. 2009.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kipedia. 2015. "Turkish General Election, 1950." ([http://en.wikipedia.org/wiki/Turkish\\_general\\_election\\_1950](http://en.wikipedia.org/wiki/Turkish_general_election_1950)) (2018/8/19)

## A Study on Modern Turkish Party Politics and Islam

Chiu-Ching Kuo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has attracted voters, called the Middle East's lead. The Party deserves our attention. Kemal formed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He was elected the first President.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he was the core of State power. The civil society is passive, controlled and vulnerable.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ruling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introduced competing political, allowing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associations. Therefore Turkey developed from the one-party system to a multi-party system. After the 1960 military coup d'état, the Democratic Party was abolished. According to the junta's new Constitution, multi-party competition gave the Islamists the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Islamists set up the Justice Party. In 1961 the Justice Party took part in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1965 parliamentary election, the Justice party governed alone, and had strong Islamic color. It became major political forces against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After the 1990 the Islamic middle class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Islamist movement, Erdogan set up the AKP. He adopted a moderate stance and pragmatic way. So the AKP enjoyed three times for a second term in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economy takes precedence over political" of the AKP is rare. The AKP has proved that Islam and democracy are compatible.

**Keywords:** Turkey, Party Politics, Islam